

# 原鄉兒少性侵案之處遇歷程與工作反思： 以屏東縣兒少保護工作為例

沈慶鴻、戴如玓、周祝滿、高信傑

## 壹、源起

「保護」(protection)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欲彰顯之兒童權利的重要面向之一，其認為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之措施，防止兒童遭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忽略性對待，以及包括性虐待之不當對待或剝削，且保護性措施應酌情採取有效的程序來形成社會方案，以對兒童和負責照顧兒童之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協助，也應採取其他預防形式，以辨識、通報、轉介、調查、處遇及追蹤兒童被不當對待之事件，以及在適當時進行司法干預（吳書昀、韋愛梅，2018）。

因此落實兒少保護的理念和行動，一直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努力的目標，然而持續上升的兒虐通報件數、不時出現的兒少受虐致死新聞，都在提醒兒少保護工作須持續精進。由於少數族群的

兒少有較高的受虐、性侵比例（Harrison, 2014; Korff, 2019），我國原住民族兒少似乎亦有相同的現象，故關注原住民兒少的受虐情形和保護措施，應是保護服務的重點工作。

屏東縣的原住民人口數次於桃園市、花蓮縣、臺東縣，居全國第四位，縣內有9個原住民鄉，原住民人口數占全縣人口數的7.32%，遠高於原住民的全國人口比（2.3%），因此原住民兒少的權益維護、人身安全，一直是屏東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性服務的重點，自2015年起也持續以「原住民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方案為焦點向中央申請公益彩券基金補助，致力於原鄉保護性服務工作的推動。

本文將呈現屏東縣社會處曾經介入的一個原鄉兒少性侵害案件，該案被害人以男童為主、多人受害、性侵害行為長期存在，且加害人同時具有宗教地位和部落菁英身分、案情涉及文化議題等特殊性的

雖然相關工作人員曾在處遇過程中於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高雄市政府主辦之研討會中報告本案（林聖峯、張佳樺、呂建鋒，2014），然因過程複雜、議題多元，因此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願在社工處遇及司法介入結束後，以專業學習和實務交流的角度，和關心原鄉兒少保護工作者分享此一社工處遇過程中的學習和反思，以期精進未來的原住民兒少保護服務工作。

## 貳、原住民兒少性侵問題值得關注

### 一、原住民兒少受虐比例高

兒少受虐是個備受關注的問題，以全國及屏東縣的兒少受虐人數為例說明如下（請見表1）（衛生福利部，2018；屏東縣，2018）：

#### 1. 2010年至2016年的受虐人數統計概況

- (1) 2010年至2016年全國兒少受虐人數平均有14,593人（9,461人至19,174人），原住民兒少受虐人數平均則有1,217人（755件至1,785件），占全國平均受虐人數的為8.83%（6.81%至11.24%）；然若從整體原住民兒少人數大約只占全體兒少人數的3.5%來看（註1）（原住民族委員

會，2018），原住民兒少的受虐比率遠超過其人口數比，這樣的現象近十年來大致皆如此。

- (2) 屏東縣兒少受虐人數2010年至2016年平均有497人（314人至695人），占全國平均兒少受虐人數的3.4%（2.7%至3.6%）（註2）；相較於屏東縣兒少人口數（3%）看來，屏東縣的兒少受虐比率略高於其人口比（註3）。
- (3) 屏東縣2010年至2016年原住民兒少受虐平均有82.6人（36人至126人），占屏東縣內兒少受虐人數16.5%，其中2012年甚至曾高達21.39%；即5位兒少受虐者中就有1位原住民；由原住民兒少人口數只占全縣兒少人口數的8.88%，原住民兒少受虐的現象實在值得重視。

2. 2017年衛福部兒少受虐統計方式改變（區分為家內受虐及家外受虐），然在4,135位遭受家內虐待的兒少中，原住民兒少就占了其中的12.21%（450人），受虐比例更高於以往的平均數（8.83%）。
3. 2017年屏東縣家內受虐的兒少人數（243人）占全國兒少家內受虐的5.8%；但屏東縣原住民兒少家內受虐人數（40人）卻占全國原住民兒少受虐人數的8.9%（450人）、

占全縣兒少受虐人數的16.46%（203人），超出相當的多。

## 二、原住民兒少性侵害比例更高

屏東縣原住民兒少超高的受虐案件，在性侵害案件的統計上亦是如此。此處同樣以2010年至2017年為例做說明（衛生福利部，2018；屏東縣，2018）：

1. 全國約有四千件兒少性侵害案件，全國原住民的兒少性侵害案件，約占了全國案件的12%（11.68%至13.33%）；此性侵害的比率更高於前述之全國原住民兒少占全國兒少的受虐比（8.83%）。
2. 全國原住民性侵害案件約有587.3件（489件至669件），屏東縣原住民性侵害約有39.6件（20件至55件），占全國原住民性侵害案件約

6.7%（4.9%至8.7%）；同樣的，此比率也高於前述屏東縣原住民兒少占全國原住民兒少之受虐比（3.4%）。

3. 屏東縣的性侵害案件約有234.4件（182件至296件），其中原住民性侵害案件平均占了全縣性侵害案件的16.9%（24件至55件），其中2014年更曾高達27.09%，亦即4個性侵害案件中，就有1個受害者是原住民兒少；此比率相似於前述縣內原住民兒少16.5%的受虐比。

由表1、表2的統計數字看來，亦即只占全國兒少人口數3.5%的原住民兒少，其受虐的比例卻占了全國兒少受虐人數的8.8%、兒少性侵害受害人數的12%；顯見原住民兒少受虐、性侵害問題的嚴重性是需要受到重視的；此問題在屏東縣更

表 1 全國與屏東原住民兒少保受暴人數比

年份	全國兒少保總人數	全國原民兒少保案	全國原民兒少保案占兒少保比	屏東兒少保案總人數	屏東原民兒少保人數	屏東原住民兒少占屏東整體兒少比%
2010	18,331	1,722	10.37%	637	86	13.50%
2011	17,668	1785	11.24%	695	110	15.83%
2012	19,174	1669	9.53%	589	126	21.39%
2013	16,322	1169	7.71%	566	103	18.20%
2014	11,589	809	7.50%	314	58	18.47%
2015	9,604	607	6.81%	333	36	10.81%
2016	9,461	755	8.67%	345	59	17.10%
2017	4,135	450	12.21%	243	40	16.46%

註：2017年衛福部統計表單修改，4135人為家內受虐人數。

表 2 全國與屏東原住民兒少性侵受暴人數比

年份	全國性侵 兒少總人數	全國原民 性侵兒少	全國原民 性侵兒少占 性侵兒少比	屏東性侵兒少 總人數	屏東原民 兒少性侵案	屏東原住民兒少 占非原住民 兒少占比%
2010	4,895	512	11.68%	219	32	14.61%
2011	5,977	645	12.10%	253	32	12.65%
2012	6,311	669	11.86%	296	50	16.89%
2013	5,495	617	12.65%	286	35	12.24%
2014	5,790	629	12.19%	203	55	27.09%
2015	5,569	639	12.96%	250	54	21.60%
2016	4,234	498	13.33%	182	35	19.23%
2017	4,487	489	12.23%	186	24	12.90%

為嚴峻，亦即只占屏東縣兒少人口8.9%的原住民兒少，其受虐的比例卻占了全國兒少受虐人數的16.5%（2012年曾高達21.4%）、兒少性侵害受害人數的16.9%（2014年曾高達27.1%），因此更需將此現象進行更多的瞭解和探究。

## 參、性侵害對兒少的影響和傷害

由於本性侵害案件具有之特性，此處將分段呈現：性侵害對一般兒少的影響、性侵害對男性的影響，以及專業人員為性侵害加害者對兒少造成的影響：

### 一、性侵害對一般兒少的影響

Finkelhor與Browne於1985提出的「兒童性侵害創傷之動力模式」是國內不少性侵害研究者引用的文獻資料，此模式

從廣泛的生活層面解釋未成年孩童遭受性侵害後在生理、心理、行為、社會等方面造成的影響，其指出在性侵害創傷後有四種可能出現的動力與行為模式（洪素珍，2008；郭雅真，2007；羅燦煥，1998）：

1. 創傷的性化經驗（traumatic sexualization）：兒童經歷到性傷害後，會對於性態度和性感受產生扭曲的觀點而產生創傷性的性行為；因在其遭受性侵害的過程中學到透過性行為可以獲得注意，使性行為成為一種手段、工具，於是造成了性關係混亂或從事性交易；另一部分也可能發展為恐懼、害怕或厭惡性行為影響個人的性功能，以致成年期無法發展正常性關係和親密關係。
2. 烙印（stigmatization）：由於加害

者對受害人的口語及態度，如指責、威脅、利誘、恐嚇、輕蔑，以及社會對性侵害事件的污名化與不相信，會讓被害人感到被標籤而有受辱感，覺得自己沒有價值、認為自己是邪惡的，或覺得是自己的錯造成的，而覺得自己是「壞、髒、丟臉、不清白」等負向自我概念，經常處於自責、羞愧、罪惡感、壓抑的憤怒等情緒，失去信任的能力，因此可能出現自傷、自暴自棄的行為，諸如藥癮、性紊亂、自殺意圖、凌虐自己或他人的身體等，並在人際關係上呈現難以維繫和不穩定的傾向。

3. 背叛 (betrayal)：受害者發現所依靠的人並不值得信任，原來依靠的重要他人卻因為相信他而遭受性侵害，尤其是遭受熟人或親人性侵時會令受害者難以再對人產生信任感，連帶對自我、權威人物、世界的看法與信任感皆受破壞；受害者容易形成憤怒、敵意、孤立隔離、阻礙了人際親密關係的建立。
4. 無力感 (powerlessness)：性侵害事件會讓受害者對自己的身體失去控制感，無力感會伴隨著被侵犯的強烈恐懼感而來，尤其是被權威人物侵犯時這樣的感受會更強烈；如果事後受害者的控訴不被相信、反

遭指責會形成二度傷害，使受害者的無力感更嚴重。尤其兒童本就較成人弱勢，生活需依賴成人的協助，故若是兒童身邊重要他人對其性侵時，加害者所擁有的控制力將會強化兒童無助感的形成。

洪文惠 (2018) 則在收集國外不少兒少性侵害的相關研究後，歸納性侵害對受害兒少可能產生包括以下六部分的影響：

1. 生理：受害兒少會出現頭痛、睡眠困擾、耳鳴、聽力受損等生理問題。
2. 心理：表現是憂鬱、憤怒、焦慮、恐懼、退縮、自我羞恥的問題。
3. 社會：社交困難、就學困難、關係困難、性化問題、酒藥癮物質濫用等問題。
4. 性表現：性早熟，可能成為加害人；也可能發展出性化行為等。
5. 教育經濟能力的影響：注意力不集中、影響學習能力、數字及讀寫能力較差等，因教育成就受限而影響生活機會（例如就業）。
6. 靈性的影響：極度憤怒、被遺棄感、自我汙衊、對人失去信任、深度被背叛感，宗教型機構的性侵害案件則會出現抗拒信仰儀式、符號，或懷疑所信仰的神祇、人神關係的崩解。

除了前述引自國內外學者有關性侵害對兒少身心造成的影響外，胡淑貞、吳慧



敏（2001）對臺南市和花蓮市高中職學生進行18歲以前性侵害盛行率及相關因子的研究，亦發現兒少期間被性侵害者較無此經驗者有高比率會出現下列現象，如經常生病、曾經自傷、自殺者、遭遇過身體虐待或疏忽、最近一年曾經有過偷竊、逃學、逃家、恐嚇勒索或曾使用迷幻藥、經常暴露在危險情境（如獨自超過12點回家、走暗巷、與初識者出遊）等，因此判斷高中職學生的行為問題與兒少期間被性侵害的遭遇可能互為因果。

## 二、性侵害對男性的影響

前述性侵害後的生心影響是不分性別的，然因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角色觀點並不有利於男性被性侵害後的求助行為，因此遭性侵害的男性常被認為是一群「沒有受害位置的受害人」（陳建泓，2015），而這也是針對男性性侵被害人的研究、實務案例皆較少的可能原因之一。

Gagnier和Collin-Vézina（2016）發現男性氣概、性別認知（不認為或無法認同某些性碰觸是性侵害）、淡化性侵結果、迴避社會污名（尤當加害人為男性時）、成功抗拒被害與否的歧視等，是男性受害者面臨是否揭露的性別文化因素，而多數未被發現的性侵害男性受害者其實是選擇壓抑記憶的（引自邱惟真、卓雅萍，2017）。

而Lew（2004）針對男性侵害受害者的研究發現，許多性侵害受害者在受害後

會懷疑自己不是男人、懷疑自己是否是同性戀，而此種在性關係裡混亂的現象，與文化期待一個男性應該要有的角色與功能息息相關；Hopper（2006）使用標準化的症狀檢核表發現，性侵害對男性被害人的影響有：焦慮、憂鬱、解離、敵意與憤怒、低自尊、關係困難、性方面的困難、睡眠障礙、自殺意念與行為（以上引自邱惟真、卓雅萍，2017）。

## 三、專業人員為性侵加害者對兒少造成的影響

雖然近年來專業人員為性侵加害者的事件屢屢出現，但對此議題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仍舊十分稀少，而洪文惠（2018）對此主題的討論則有助我們加深對此議題的認識。

1980年代美國記者揭發神職人員性侵兒童（clergy-perpetrated child sexual abuse）的事件後，引發了社區恐慌，學術界因此開始關注此議題，其中Finkelhor及同僚（1988）引領的全美托育中心性侵現象的研究則為此類研究領域的濫觴；英國學者Sullivan和Beech（2002）提出「專業人員性侵加害者」（professional perpetrator）一詞，指「成人藉由機構或組織的身分地位加害特定兒童；無論組織的性質是公立、私立，提供的是自願服務或強制治療，加害者藉由在信仰團體、學校、育幼或安置機構等創造的隱秘特質來

操控及進行侵犯兒少」皆屬此類加害型態（引自洪文惠，2018）。

McAlinden（2006、2013）跳脫過往加害人以物質或非物質利誘受害者的論述，轉而關注加害人如何操控環境、重要他人和被害人以達到性侵目的，其以「浸潤（grooming）」一詞說明專業人員性侵的歷程，認為浸潤是兒少性侵的開端，是一個藉以讓性侵持續發生的手法，即「加害人有意取得兒少受害者及其重要他人（特別是其家人）的信任後，達到性碰觸兒少、再進一步性侵的目的，並抑制兒少揭露、避免犯行被揭發的過程」；其指出此行為的發展包括三階段：(1)接近兒少、(2)確立兒少會對其順從及信任、(3)強化保密避免遭受揭發，而浸潤過程則可深化加害行為，以及合理化或否認罪刑的（引自洪文惠，2018）。

Sullivan 和 Beech（2002）曾分析 41 位接受強制社區診療的專業人員加害人的口特質（神職人員、教師、教保人員、社工），以了解加害本質，此研究樣本數之加害者以神職人員居多（27 位，66%）、教師次之（10 位，24%）；O'Leary、Koh 和 Dare（2017）以專家敘事回顧（narrative review）的方法綜整機構性侵浸潤的文獻，採浸潤手法的加害人多數屬狩獵型（predatory），擅於操控環境，有多次成功侵犯特質，例如特別禮遇兒少、饋贈物質等方法利誘，正常化跟兒

少之間過度親密的關係、誘騙照顧者或照顧環境，犯罪後用合理化的互動關係來脫罪（引自洪文惠，2018）。

## 肆、原鄉兒少性侵案件的處理歷程

### 一、案件之特殊性

為讓本案處遇經驗能發揮專業教育和訓練之目的，本案從通報到法院宣判三級三審歷經兩年。作者認為本案例之特殊處包括：

1. 案件曾經媒體披露，引發地方議論。
2. 家長把從學童處聽來的事情告知學校，學校於是進行責任通報，通報事由為「學生遭長輩撫弄下體產生心理不舒服」之案件。
3. 本縣篩案組經檢視通報表內容並無明顯性猥褻、性侵害之狀況，遂轉兒少保案件派予中心同仁調查。兒少保社工介入後才發現是持續多年、多人受害、程度不一之性騷擾、猥褻、侵害之重大案件。最後確認受害兒少超過 10 人，包括男童、女童（以男童為主），因事件持續多年，部分受害兒童已為國中生。
4. 多人受害的事實非一次會談就發現，而是主責社工入校調查，在與被通報學生會談時發現，而與不同

學生會談又收集到更多受害者名單，因此事件調查是在「會談收集、受害確認」等連環動作下完成的。

5. 半數以上受害孩童的家庭狀況為單親、隔代教養，具監護權的父母（父或母）大多在外縣市工作，孩童平日多由祖父母照顧。
6. 加害人為部落中同時具有宗教、文化地位，受人尊重的長者；與部分受害孩童還有親疏遠近不等的家族關係。事件多發生在加害人家中，加害人常邀部落孩童至其家中玩電腦遊戲，並經常餽贈禮物、提供零食和糖果。
7. 加害人承認有撫摸部落孩童性器官之行為，但辯稱此係傳統文化中長者對男童的祝福，無性騷擾之犯意。
8. 在發現可能案件已存在多年且多人受害，而需收集已畢業學生之受害名單時，學校通報窗口曾為此感到為難、不安，認為畢業學生受害已是過去事，再去追溯是否有揭瘡疤之嫌，也擔心部落成員對其通報的不諒解。

## 二、各部門於性侵害案件處遇過程中的介入作為

兒少性侵處遇係跨部門、跨網絡的

工作，整體上網絡依權責扮演不同角色，教育學校單位負責案件通報及預防宣導角色，社政主責被害人服務包括調查評估、資源媒介、網絡協調，警政及地檢署主掌案件偵辦調查之司法程序。

### （一）社政部門

1. 通報初篩：通報篩案組經檢視通報表後認為內容並無明顯性猥褻、性侵害之狀況，遂將其轉為兒少保案件派兒少保同仁進行調查。
2. 調查評估：負責此案的兒少保社工針對通報案至學校進行調查訪視，被通報學生的說詞（其他人也有）讓社工於現場即增加與其他可能受害的學生會談，並發現此案不止於性器官的撫摸，可能還有肛交、猥褻等行為；與學生確認後當天同時進行社政及校安通報。
3. 通報警政：由於多位孩童受害，且為爭取時效，社會處指派四名社工分別陪同受害兒童至不同警政單位進行減述筆錄。筆錄期間，學校教導組長亦陪同；為了向家長說明，學校、社會處分別至13名學童家中進行家庭訪視，向家長說明司法流程及評估個別家庭需求，以提供相關協助及支持。
4. 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陪同受害兒少在警政筆錄完成後逕至地檢署接



受複訊。

5. 安排宣導講座：為免錯誤訊息、八卦傳聞造成家長、孩童身心壓力，通報半個月後，即邀請專家至學校進行性侵害防治宣導課程『人身安全-停、看、聽』，並於社區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6. 展開相關處遇服務：筆錄完成後（通報第2個月至第6個月），考量受害者年齡及發展階段不同，先針對國小受害學童進行團體諮商，之後再視被害人受創傷度安排個別諮商；辦理「照顧者支持性團體」，以分擔照顧者所面臨的壓力、建立與照顧者的聯繫管道，及收集照顧者意見等。
7. 委任律師：案發約2個多月，俟地檢署刑事偵辦確定起訴，縣府社會處為維護被害人及其家屬權益，集體（13位被害人）委請長期合作具有兒少性侵專長之律師協助刑事並附民事賠償請求。
8. 安排心理衡鑑：檢調過程中，縣內尚未建置早期鑑定程序，故尚未於司法偵辦階段安排心理衡鑑；而分別以團體諮商及個別諮商進行輔導，其中2名進行個別諮商之被害人，經諮商師評估可能有壓力後創傷症候群（PTSD）而安排心理衡鑑，並主動提供心理衡鑑報告給地

方法院參酌。

9. 申請假處分：為避免加害人脫產，透過委任律師先將加害人財產聲請假處分，由於財產扣押需繳納一定比例之裁定費用，因此由縣府向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申請，出具保證書以代替假扣押擔保金獲准，免繳保證金。
10. 召開重大性侵案件檢討會（於偵查階段，尚未起訴前召開此會議）：邀集原住民處及相關單位針對原住民部落文化及性侵害防治議題商討策進作為，各網絡單位並視處遇進度召開協調會議。

## （二）警政部門

1. 警局接獲社會處通知後，由婦幼隊協調各分局協助並統籌案件偵查，報請並配合檢察官指揮偵辦。
2. 隨案件越滾越多，警政、社工與學校分工，共同協助完成偵辦及複訊之減述程序；而後由學校及社工協助聯繫家長，告知家長帶學生至分駐所偵訊之事項。

## （三）司法部門

1. 提供安全保護：本案因具重大性，立即啟動司法偵察，且考量當事人受到證詞汙染或減少證據被湮滅之可能性，由檢調指揮偵辦進行「減

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之程序。

2. 進行預防性羈押：為加快司法偵辦進度，檢調認為有必要時即會對加害人進行「預防羈押」，此舉亦可保護被害人身心安全並鼓勵隱藏的被害人出面。

#### （四）教育部門

1. 學校通報後，配合社會處協助釐清案情和調查工作，並於事發後第16天，即邀請社工到校進行兒少保護及性教育基礎講座。
2. 暑假期間，學校為學生舉辦營隊以輔導其走出傷痛；但為免標籤化，於是進行全校性營隊，計有歌舞研習營、田徑訓練營、射箭研習營等。

### 三、案件處遇過程中的兩難與困境

#### （一）學校系統「報與不報」的為難

學校通報時，並不瞭解通報案件的複雜性，只保持著一般疑似性侵案件進行通報處理，但在社工到校訪視發現可能是涉及性猥褻且是持續多年、多人受害的案件時，教師與校長才開始擔心後續引發的效應，學校系統雖一方面配合調查、一方面也對越滾越大的性侵害案件呈現通報「可能不被部落或加害人家族諒解」，但又擔心學生受害，且須依法責任通報的焦慮與矛盾處境。

#### （二）加害人之部落菁英位置對案件處遇的干擾

加害人為退休人員，具長老身分、掌教會職務，曾參選民意代表、熱心地方事務，常自掏腰包照顧孩童，在部落具有頗高之聲望和貢獻；性侵事件揭露後，多數部落民眾完全不相信此事，甚至出現此事是選舉對手誣陷、被害孩童家人要錢等傳言，由於其家族勢力龐大，在司法審理期間，其家族成員邀請部落長輩透過各種方式遊說，要求與被害孩童家人進行和解，期待能動之以情試圖減輕案情、影響判決結果。

#### （三）企圖混雜文化意涵之侵犯行為

排灣族傳統文化認為生殖器具有傳宗接代、傳承之意涵，因此「長輩撫摸、親吻孩童之生殖器有給予祝福之意」成為本案司法訴訟之辯論焦點；加害人辯護律師以傳統文化習俗非侵害論述要求交互詰問，因此縣府首度運用熟識之排灣族文化之專家證人。專家證人與本案加害人、被害人為不同部落，願意在法庭上作證，論述傳統部落文化對撫摸下體與性侵意圖之差異（傳統文化之祝福意圖只對幼小孩童、多數在家族聚會的公開場合下進行，孩童的父母大多在場，且無性慾望產生），以鞏固法官判決之正確心證。

#### （四）被害孩童監護人多不在部落且聯繫困難，隔代祖父母飽受和解及輿論壓力

通報後，社工訪視到至警局製作筆錄過程中，學校曾多次提及是否要通知家長，然因部分孩童監護人在外地工作，通知過程並不順利；且對於何時應通知家長？由誰通知？學校和社政、警政的想法並不同；學校擔心的是家長反彈，社工、警政擔心的則是消息曝光後造成採證工作上的干擾。

另外，由於家長多不在家，得知訊息後除了著急外也無力處理，只能授權主要照顧孩童的祖父母處理，然孩童性侵事件在加油添醋後成了八卦傳聞，不僅複雜化了事件，也模糊了孩童性侵後可能受到的影響，且在人際互動綿密的部落裡，祖父母直接承受來自家族、親屬網絡對於和解、原諒的遊說，不僅心理壓力頗大，面對司法的立場也容易動搖。特別的是，由於與加害人關係的親疏遠近不同，13個受害孩童之照顧者對性侵事件的態度也不相同，以致出現分歧的和解立場、不同的和解金額等，皆增添性侵案件處遇上變數。

#### （五）部落認為國家機器太快介入，破壞部落重視協調、道歉和賠償的機制

部落不少長者及民眾認為學校通報，和社會處、警察及檢調單位的介入太快，

讓其覺得措手不及；學校校長、主任受到不少壓力與責備，被批評不了解部落文化、把事情鬧大、破壞部落和諧及名聲，而家長會長也被認為未積極與學校溝通、未制止此事而讓其不斷延燒，才會導致部落家族、長輩尚未居中協調，就太快的、秘密的讓社工進行兒少偵訊、警方與檢調單位介入調查後讓加害人被羈押；不少部落民眾認為太快採取司法手段，傷了整個部落的感情，以致最後不僅被害家屬飽受壓力，加害人配偶、子女也因蒙羞而無法繼續在部落生活等情事。

## 伍、實務案例帶來的工作反思

### 一、兒少保社工對性侵案件的敏感度制止了傷害的繼續存在

本案在家長反映孩童間的傳聞後，由學校進行通報，但通報案件的篩案組社工檢視通報單內容後認為並無明顯性猥褻狀況存在，遂轉兒少保案件進入一般兒少保護案件的派案流程。然兒少保社工收到派案單後依流程進行調查評估，雖然被通報孩童提供的資訊並不充分，但在社工後續詢問「是否有其他兒童有類似經驗」時，才驚覺可能有其他人也受害，當下立即再請學校安排其他兒童的會談才輾轉知悉可能有5人被害，之後再由5人陸續找出13人。當時若無主責社工的敏感度，可能無法即時制止此一存在多年的案件。

## 二、網絡合作性佳、資源完整度高是本案處遇成效的主因

本案在社工訪視後發現可能有多人受害時，即在校訪當場與督導進行電話討論，督導第一時間就與婦幼隊聯繫而報請檢察官偵辦；一次完成5位學童的偵訊，後又在偵訊過程中發現其他被害人。而從通報到2次偵訊，僅10天就完成8名被害人筆錄；之後，因考量加害人的部落地位擔心案件複雜化，檢察官即在通報後的第12天就偵訊加害人，並在偵訊後聲請羈押獲准，而這也使後續讓受害較深、較年長的少年願意坦誠揭露受害的關鍵之一。

而在司法程序順利進行後，接續展開的兒童團體、家長說明會、個別諮商，同時協助家長集體委任律師代理訴訟，進行加害人財產假處分，並連結法扶基金會協助民事求償等，都需靠網絡成員的積極參與及充分合作才能達成，特別是能邀請到讓孩童、家長較能信任的原住民諮商心理師，以及有熟悉排灣族傳統文化且具排灣族身分的族人願意出庭擔任專家證人，更是此一性侵案件能順利進行的關鍵。

## 三、原鄉案件的處遇，除「專業處遇」外，還應加上「文化處遇」才算周全

本案的社工、司法處理過程迅速，通報後不到9個月就已完成一審判決、17個月內就完成二審，而20個月內就三審定

讞，的確達到兒少保護的目的；然而讓學校校長、主任、家長會長，以及被害家屬承受壓力，讓加害人配偶、子女因蒙羞而搬離部落，甚至讓部落不少人覺得本案的處理破壞部落傳統的犯罪和衝突處理機制，則是本案處遇過程中最大的遺憾之處。

沈慶鴻（2014）曾以其研究原鄉家暴的經驗提醒，主流社會的司法系統與原住民社會對於有關衝突處理、正義（justice）的實質內容和達到正義之過程的觀點不同，源自於西方社會強調個人權益、界線之政策理念，與原住民社會重視「家庭／家族」、「集體價值」、「部落和諧」，關注「關係」之傳統文化不符；因此不少國內、外研究者建議「應在考量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和結構因素，發展具文化適切性（culturally appropriate model），且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家暴防治機制和處遇方案」（沈慶鴻，2014；黃源協等，2008；鄭麗珍、李明政，2010；Nickson et al., 2011）」，因此若將此一提醒和建議運用於本案，或許可在被害孩童偵訊筆錄完成、加害人被羈押後，主責兒少保護工作的單位就可與部落展開互動，例如增加拜訪部落頭目、耆老、宗教領袖，及加害人家族長輩，以取得他們對兒少保護工作的支持，誠懇的向他們說明案件處理的過程、收集其建議等步驟，相信尊重部落系統、看重部落的支持應能逐漸



減少部落的流言，減輕相關當事人被孤立的壓力、部落被撕裂的現象而周全原鄉處遇的工作。

#### 四、符合在地特性，應成立原鄉保護性工作之諮詢團隊

由於原住民人口數的高比例，及持續呈現超高的原住民兒少保護、性侵案件數，均提醒了本縣社會處應針對此一特殊性發展有效的因應措施；由於不論社政、原政皆強調尊重多元文化、增加文化敏感度、發展多元處遇方案的狀況下，成立符合在地特性和需求的團隊實屬必要。處遇本案的經驗發現，除現行的社政、教育、警政、司法等網絡成員外，連結同時具有原住民身分及熟悉原住民文化的文化、心理專業人員，更是處遇原鄉案件不可少的人員。此外，本案處理過程中原期待在地的原家中心能發揮協助處理的功能，但發現原家中心社工反而因在地人的身分、立場而難以介入，而諮商心理師及文化專家證人之所以願意介入，也是因其非在地部落成員而較無角色和關係上的壓力，故此一保護性工作諮詢團隊成員在邀請時，應跨鄉鎮、跨族別邀請，以能符合脈絡情境、案件多樣性之實務需求。

#### 陸、結語

本文所指之性侵害案件源於家長聽聞孩童間的傳聞而知會老師，經學校通報、兒少保社工校訪調查後才敏感於此一持續多年、多人受害之性侵案件的存在，而在迅速、有效的網絡連結後達到保護兒少的目的。由於本案不只是單純的性侵害，還具有未成年兒少、男童、專業人員造成的性侵害等特性，在關注原住民兒少性侵害問題時，本案的處遇經驗或可做為其他縣市政府、原鄉工作者的參考；期待未來能在「專業處遇」外發展「文化處遇」工作，以豐富社工專業領域裡的多元文化知能和工作模式。

（本文作者：沈慶鴻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戴如玳為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科長；周祝滿及高信傑為屏東縣政府家庭中心社工督導）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張佳樺科長、三地門原家中心潘美芳社工，以及所有參與討論的各區家庭中心督導及社工，沒有各位貢獻的實務經驗與智慧，本文將無法完成）

**關鍵詞：**兒少性侵害、兒少保護、原鄉

#### 註 釋

註1：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的統計，原住民18歲以下的兒少人數約占全國兒少人數的



3.5%

註2：根據內政部（2019）的統計，屏東縣18歲以下的兒少人口數（119,458人）約是全國兒少人口數（3,980,814人）的3%。

註3：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的統計，屏東縣原住民18歲以下兒少人口數（12,999人）占全縣兒少人口數（119,458人）的8.88%。

##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2018）。〈內政部統計年報（人口年齡分配）〉。內政部（<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sn=6463>）。
- 吳書昀、韋愛梅（2018）。《兒少受虐現況問題暨保護工作成效研究》。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
- 胡淑貞、吳慧敏（2001）。〈台南市和花蓮市高中職學生進行18歲以前性侵害盛行率及相關因子的研究〉，《公共衛生》，28（2）。頁135-150。
- 沈慶鴻（2014）。〈親密關係暴力防治之現況檢視：原住民觀點〉，黃源協主編，《部落、家庭與照顧：原住民族生活經驗》。臺北：雙葉。頁135-162。
- 林妙容、洪素珍（2012）。《兒童及少年家內性侵害被害人社工處遇模式之研究—安置評估與創傷復原》。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
- 林聖峯、張佳樺、呂建鋒（2014）。〈是「愛」？還是「礙」？部落男童性侵害案件跨專業多元處遇初探〉。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辦「精進與傳承—2014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跨界處遇與研究」研討會。
- 邱惟真、卓雅萍（2017）。〈臺灣少年性侵害循環影響因子與司法處遇之探討〉。《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頁249-270。
- 屏東縣（2018）。〈屏東縣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統計資料〉。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 洪文惠（2018）。《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性侵害防治工作模式》。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研究。
- 洪素珍（2008）。《男童及少年安置機構性教育及性侵害防治計畫》。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940F9579765AC6A0>）
- 郭雅真（2007）。《童年期遭受性侵害成年女性倖存者個別諮商經驗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黃源協、莊正中、童伊迪、侯建州（2008）。《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之規劃》。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衛生福利部（2015）。《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臺北：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8）。〈兒童及少年保護、性侵害犯罪防治統計資訊〉。衛生福利部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2.html>）。

鄭麗珍、李明政（2010）。〈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與健康政策評估〉，黃樹民、張英華主編，  
《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181-258

Korff, J. (2019). Sexual abuse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https://www.creativespirits.info/aboriginalculture/health/aboriginal-sexual-abuse#fn4>

Harrison, D. (2014). Indigenous children suffer more abuse.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indigenous-children-suffer-more-abuse-20140708-3bl9n.html>

Nickson, A., Dunstan, J., Esperanza, Z., & Barker, S. (2011). Indigenous practice approaches to women, violence, and healing us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workers. *Australian Social Work*, 64(1), 84-95.